

李云 在上海街头寻回毛岸英兄弟

获取国民党“围剿”计划

李云,1915年7月生于江苏苏州,两岁时,全家搬到了上海。1929年4月,李云在小学六年级时,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

小学毕业后,李云考上上海旦华中学,开学不久,就由团组织安排在闸北丝厂工会做青运工作。1930年8月,她参加“党训班”学习,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被纳入中央特科系统工作。

李云加入特科后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策反国民党军官惠东升。1932年,经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陈云批准;李云和徐强(后来成为李云的丈夫)从上海被紧急派往河南,执行一项特殊任务,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惠东升。惠东升时任国民党军80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营长。

通过调查了解到,惠东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,曾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,为人比较耿直,很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现状。有一次,惠东升来上海,和朋友冯三昧说起过自己的想法。在老朋友冯三昧的说服下,他转为支持共产党。徐强了解情况后,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,可以做他的工作,让他投奔革命,提供情报。惠东升要求我党派人过去,到他的部队开展基层工作。派过去的人有好几个,其中李云作为惠东升的“侄女”,徐强则作为惠妻的“表哥”。

他们过去后,通过惠东升取得了不少情报。其中最重要的情报,是通过惠东升的学生、国民党政学系杨永泰的秘书,获取了国民党军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的计划。徐强拿

到这份计划后喜出望外,急忙交给李云。李云连夜用药水将“围剿”计划抄在一条线装的古籍里,而后将它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,以及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,放在一条棉被絮里,打包成行李。当时天气还有些冷,这样不会引人注意。

接着,遵照徐强的安排,李云将放有“围剿”计划的棉被絮,交给潜伏在河南国民党军中担任文书的老傅,送到上海党组织手中。为此,徐强等人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。对于其他密件和情报,徐强他们也及时通过联络员,送往上海党组织。那一年,李云年仅17岁。

寻回流浪的毛岸英兄弟

1935年秋,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,但上海地下党组织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。此时,中央特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(或称交通站),邱吉夫为总负责人。徐强负责情报,是李云的直接领导。

一天,徐强突然通知李云,要她想办法上街寻找两个男孩子。鉴于中央特科的纪律,孩子的身份对她也是保密的,李云能知道的信息有限,大致就是:大的十三四岁,小的十一二岁。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,从收养家里跑掉了,判定已流落街头。徐强对李云说,兄弟俩形影不离,要她按照这个特征,重点在老西门附近地区仔细寻找。

李云接受任务后就意识到,这两兄弟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。李云的直觉是对的,这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。1930年11月,杨开慧牺牲后,党组织从湖南把毛岸英、毛岸

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,三个孩子被安排在牧师董健吾(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)任园长的上海大同幼稚园中。其间,最小的孩子毛岸龙因病夭折。1932年春夏之交,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,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,两兄弟被接到了董健吾的家里抚养。

1935年,董健吾去外地出差筹措经费,他并未告知家人抚养的那两个孩子的身份。因某些原因,毛岸英、毛岸青离家出走,下落不明。董健吾出差回来后,便将相关情况上报。特科领导立即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,但一无所获。

后来组织上决定,将继续寻找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李云,并对她寄予厚望。但这个任务的完成其实相当困难,因为人海茫茫,何况街上还有许多特务暗哨,为了不暴露身份,不敢随便打听。据李云晚年回忆说:“接到寻找两个孩子的任务后,我赶紧上街,可上海那么大,到哪里找?找了好些天,都没有发现他们。”

能发现他们,实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找了半年多后的一天,当时李云一路寻找,来到城隍庙附近,那里流浪儿比较多。由于半天没吃东西,又走了很多路,李云感觉很饿,想在小吃摊买碗粥填肚子。刚好在粥摊边上,她看到有两个男孩子,长得很瘦,穿的衣服也很破,年龄上也是符合的。旁边的老百姓说,这两个孩子从来不说话,很可怜。李云就请他们吃粥,同时问一些问题。但无论怎样问,他俩什么都不讲。

李云不敢多问,连忙将情况上报,党组织派冯雪峰(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)前来进行核实,确认孩子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。

到宋庆龄身边工作

1936年5月,宋庆龄和冯雪峰在一次会面时提及,自己有事要和党联系时不太方便,希望派一位党员经常和她联系。不久,党组织选定李云作为上海党组织与宋庆

龄之间的联络人。

5月下旬的一天,李云前往莫里哀路(今香山路)29号宋庆龄的寓所与宋庆龄见面,两人一见如故。此后,李云作为宋庆龄秘书(实际上是联络员),每星期去宋家二至三次。一个多月后,为了联系更为方便,李云每天都去宋庆龄处。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,宋庆龄寓所周围有特务监视,李云每次进出宋庆龄的寓所都小心翼翼,不得不经一番乔装打扮,甚至有时还要在半路上改装,或兜马路、跑商场,直到确保身后没有“尾巴”。

1937年春,李克农利用到上海治疗眼睛的机会,通过李云与宋庆龄约定会见时间见了面。7月初,中共代表团周恩来、博古、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会谈后到达上海,他们要会见宋庆龄,也由李云转告并约定会见时间。可以说,在这一时期,我党以及有关人员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,几乎都是通过李云进行的。

1937年的一天,宋庆龄和李云谈了一些事情后,突然问李云:“我现在算不算党员?”李云心里一热,但不便直接回答,就说:“我回去问问。”随后,李云向潘汉年请示应如何答复。潘汉年表示:“孙夫人的入党问题,必须中央来考虑。”他又说:“明天你对夫人说,你和共产党员一样。”宋庆龄听了李云的答复后特别高兴,一定要留她吃饭。

1937年8月13日,日军进攻上海,淞沪会战爆发,上海陷入日军的包围。李云向宋庆龄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内容,请宋庆龄去香港避险。临行前,宋庆龄要求李云继续陪同她。在组织批准下,李云于12月23日登上香港邮船,继续陪在宋庆龄身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宋庆龄提出要李云协助她做中国福利会的工作。1952年6月,组织上调李云到中国福利会工作,宋庆龄安排她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。从此,两人又长期在一起工作,续写深厚的友谊。

据《党史博览》 裘伟廷/文

傅雷对母亲言听计从

1908年4月,傅雷(现代翻译家)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,他幼年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

1927年,傅雷长大成人,经过反复的思考,他向母亲提出去法国留学的想法,母亲一口应允。出国前,母亲为他 and 表妹朱梅馥订了婚。虽说是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可也不尽然,他与表妹也是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,两小无嫌猜。”二人自小就在一起长大,旧式婚姻中也有很大成分“自由恋爱”的内容。

留学法国期间,傅雷与一位金发碧眼的巴黎女郎玛德琳相爱了,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恋情。他们爱得轰轰烈烈,结束得也轰轰烈烈,爱恨交加。异国之恋也曾使傅雷鼓足勇气,给母亲写了一封信,壮着胆子说“婚姻应该自主”,甚至还说“在异国已有意中人”。

信是让同在巴黎的好友刘海粟代寄,信交刘海粟没多久,傅雷就要求刘海粟把信中那些“大逆不道”的话涂抹掉。刘海粟也是个孝子,知道这封信将会给傅雷的母亲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于是他瞒着傅雷,把信压着

没有寄出。

在这件事情中,傅雷犹豫的个性表现得十分鲜明。傅雷和玛德琳终于分手了,其间固然还有别的原因,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母亲所定的婚约,似乎他对异性的爱恋,不是取决于热恋中的意中人,而是远隔重洋的母亲。

这并不令人意外。傅雷的少年时光是在母亲的责罚中度过的,读书稍有懈怠,母亲的戒尺就会落到头上。有一次傅雷逃学,母亲竟然把他捆了起来,拖到水塘边,要将他沉塘。幸被邻居劝下。虽然母亲的教子方式凶了一点,但傅雷体会到了母亲的苦心,也就对她言听计从了。

当刘海粟看到傅雷茫然若失的样子时,便告诉他:“信没有发出,还在这里,你尽管放宽心吧!”傅雷听后感动得失声痛哭,可又愧疚地说:“但是,我毕竟写了这么一封信啊,我对不起她们。”他觉得自己萌发的是邪念,在思想道德上有负于母亲和朱梅馥,尤其是母亲,因为这桩婚姻是母亲做的主。

据《团结报》 张家康/文